

论衡

◀ (上接 15 版)

料,以代替缺失部分,否则古老的成分无法重归原位。法国专家认为:“在确实合适的解决方法中‘原物归位法’具有不可抗拒的特性,真正的浪漫主义是在古老石块建成的倾圮庙宇中,有能力将业已消失的再度升起。”将倒塌的建筑构件重新组合起来恢复建筑物原状的做法,在 1964 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中已得到确认。

虽然各国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尽相同,但是对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却无大的分歧。鉴于此,中国工作队借鉴了法国队的“原物重建法”经验,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又有新的创新和发展。法国人认为:“潮湿是砂岩的主要敌人,必须将重建的结构以水泥基底完全与土地隔离开。隐藏在墙后面方的部分也要以水泥加固。”中国工作队则在基底加筑一层厚约 30 厘米的三合土垫层,并将原来的砂岩基础深度增加了 60—90 厘米,同时将基础石块之间的缝隙浆水泥砂浆,防止基座内砂土的流失。同时还提出对添配构件应以满足结构稳定为需要而不是追求建筑的完整性。

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对中国工作队修复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柬埔寨文化部的一位官员曾说:“中国工作队把散落在地的石构件拼对成型,修旧如旧,像古代的一座庙宇的做法,是保护吴哥古迹的第一好方法。”中国工作队的维修项目施工结束,成为了当地最受欢迎、最具特色和最有实效的文化成果之一。

毋庸讳言,就吴哥古迹保护而言,我们中国工作队是后来者。由于吴哥古迹类型繁多,损坏情况有别,各国文物保护专家理念也不尽相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原物重建法”已被各国普遍采纳,石质建筑是实施“原物重建法”最基本的条件,倒塌的建筑物石质构件必须保存在原地,如此才有条件进行建筑复原。但是在吴哥核心区之外有些建筑遗址内石构件遗失严重,是否还有必要对建筑进行复原?在此情况下,也许我们对此类建筑遗址进行适当的考古发掘,掌握其建筑的整体规模、布局和属性,要比单纯的复原建筑更有意义。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一门科学(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序言》,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年)。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吴哥历史?因为研究中国文明,光靠我们自己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比较研究,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本身。他建议,在掌握中国考古学成果之外,有必要去认识外国的、世界的考古学。

李学勤先生曾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将比较考古学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第三个层次就是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是大势所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而在吴哥古迹保护和综合研究中考古

工作是基础,只有对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弄清遗址的规模、结构和属性,才能在以后的修复过程中对遗址有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如,暹粒机场(Siem Reap Airport)扩建时,在边寺特洛(Prasat Trapeang Thlok)和托斯塔螺(Tuol Ta Lo)四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 10—11 世纪的居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及与之相关的稻田遗址。国外考古学家利用激光雷达对荔枝山丛林覆盖地区成像,发现了一座吴哥时期的早期城址。该城址比吴哥寺遗址的历史还要早大约 350 年,它是吴哥王朝第一座城市,始建于公



周萨神庙修复前(上图)后(右图)



茶胶寺一层台西南角修复前(上图)后(右图)



元 802 年。同时他们还对吴哥寺及早期都城贡开周围展开调查,发现寺庙、城市周围有大量的街道、居址、寺庙、水塘等遗迹。

又如,吴哥城以东 90 公里处的圣剑寺(Kompong Svay Preah Khan)是吴哥王朝时期面积最大的封闭式遗址,占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遗址修建在并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很多学者纷纷猜测遗址的目的,最终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使大家了解了该遗址的性质。

以现存的都城、寺庙等建筑为核心的历史考古研究以及对 1300 余通碑铭的解读,可以大致勾勒出吴哥时期的社会面

貌。但是在吴哥古迹考古的数量和精细化程度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许言、王元林:《吴哥古迹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回顾和思考》,《中国文化遗产》,2018 年 2 期)。如,荔枝山早期都城(802—835)、罗洛士巴孔都城(Hariharalaya Roluos Bakong 835—889)、巴肯山吴哥城(Phnom Bakheng Angkor city 889—900)、贡开都城(Koh Ker 928—942)的具体位置、规模和形制结构现在都不是很清楚,除了石构件建筑外,居址面貌不清,考古资料匮乏。虽然有国外考古学家使用激光雷达探测出吴哥古迹的核心区主体寺庙之外有大量的河渠、街道、居

址、池塘等遗迹,由此而得出吴哥王朝时期的城市是一个由大量堤坝、灌溉系统、民居房址、道路和稻田组成环绕的城市。但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通过激光雷达探测得出如此结论难免有些仓促和谨慎,如此规模的遗址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其进行精细化作业,对遗迹进行分期和归纳。

从 20 世纪至今,西方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在吴哥地区的考古活动一直未断,他们对吴哥古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掌握着话语权,吴哥古迹考古主流理论和观点也是由他们主导。如,乔治·赛代斯、亨利·马绍尔、亨利·帕尔芒捷(Henri Parmentier)等,在吴哥历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虽然中国在吴哥地区工作二十年,但是我们的考古工作只是配合古遗址的保护和修复,处于边缘地位。我们在吴哥古迹考古研究方面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尤其是在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人群迁徙、文化、经济交流领域,考古研究严重滞后。我们对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吴哥古迹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的视野下开展的考古工作及吴哥文明与古代高棉史的综合研究还比较欠缺,研究成果与影响力不相符。

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指引,为我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吹响了号角。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我们需要建立自己关于吴哥古迹考古学的话语体系,以增强中国学者在吴哥古迹研究方面上的话语权。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一直与东南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东南亚低地地区的粳稻起源于中国;粟的种植,猪、狗及牛的驯化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又如,青铜冶金术存在一条从中原向华南再向东南亚传播的“金锡之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和考古学资料,就难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在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特质的时候,由于不了解其他古代文明,没有开展相互比较的基础,也使我们认识自身特质时遇到严重困难(王巍:《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与展望》,《考古》2017 年第 9 期)。了解吴哥古迹历史就是了解当代东南亚的文化,也是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